

漢語鼻音韻尾的消變及相關問題

冉啓斌

漢語的音節結構可以分爲聲母、韻母、聲調三個要素，鼻音韻尾祇是韻母結構之下韻尾位置上的一個成分。但是這個成分卻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關注。一方面，研究者們發掘了大量方言和歷史上的材料來探討鼻音韻尾的歷時演化表現；另一方面，研究者們又從共時的角度、用實驗等方法來考查鼻音韻尾的特性及其變異情況。漢語鼻音韻尾之所以受到這樣多的關注，究其原因在於它可能牽涉到整個漢語語音演變的規律性問題，進而也可能與漢語音節結構類型的轉變問題有關。不少學者指出漢語鼻音韻尾在歷時的發展中處於消變的過程之中，並對鼻音韻尾消變的規律、原因等進行了分析。有的學者據此認爲整個漢語的韻母系統都是朝着單元音方向發展的。本文擬對有關鼻尾消變的情況、規律等研究進行梳理，並就其中的某些問題作一點討論，以期對鼻音韻尾的研究有所助益。有關對鼻音韻尾進行共時、實驗方面的研究另見拙文《漢語鼻音韻尾的特性及多角度研究》（即出）。

1. 方言中的鼻尾消變

“切韻”音系收鼻音韻尾的字在現代漢語方言中表現很紛雜。鼻尾的多少、是否出現鼻化、鼻尾的有無等，都很不一致。但是從整體上看，大多數現代漢語方言中的鼻音韻尾是不如“切韻”音系完整了。“切韻”音系有一m、一n、一ŋ三個鼻音韻尾。現

代漢語方言與“切韻”音系對比，具有三個鼻音韻尾的方言主要存在於粵、客家、桂南平話和部分贛、閩方言中。佔絕大多數的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徽語、桂北平話和部分贛、閩方言，與“切韻”音系的三個鼻尾相比，都不同程度地簡化了，其中有的方言甚至完全丟失了鼻尾。詹伯慧（1981：39）寫道：“在相當廣闊的地區內，存在着一n、一ŋ 弱化爲鼻化韻，甚至消失而轉化爲純口韻的現象。”由於鼻尾不完整的方言點衆多，情況複雜，這裏不打算對具體的方言進行描述，祇就有關綜合考查方言鼻尾的文章略作介紹。

陳淵泉是最早對現代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消失的現象與規律進行全面考查的學者，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先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他的博士論文（Chen1972）以漢語方言材料來探討鼻化的共性特點^①。Chen（1973）主要以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利）製作的“計算機語音匯典”（Dictionary on Computer，省作DOC）對漢語各方言的韻尾情況進行比較，也利用了吳、閩南、河北、湖北、雲南的方言調查材料。DOC的方言材料包括了《漢語方音字彙》（1962）的17個方言點和上海話。Chen（1975）則以1364個方言點的材料進一步考查漢語鼻音韻尾的演化、鼻化的特點、鼻化消失的特點等。

張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1983）是一篇長文，以方言材料中的實際例證對鼻尾進行了綜合考查。他以“將近二百個方言點來說明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消失的現象”，對不同元音後附不同鼻音韻尾時的鼻尾變化情況分別進行了考查，分爲“低元音後附舌頭鼻音韻尾”、“低元音後附舌根鼻音韻尾”、“前高（不圓唇）後附舌頭或舌根鼻音韻尾”、“後高（圓唇）元音後附舌根鼻音韻尾”四個部分。這些方言點主要集中在吳語和官話方言中，其中吳語40個方言點，官話119個方言點，另外“有三十二個方言點是介乎吳語和官話之間的”，這樣共191個方言

點。文章的附錄一列出了這 191 個方言點的名稱。張琨《漢語方言中聲母韻母之間的關係》(1982) 實際上是張琨(1983) 的第二章。附錄一列出的“鼻音韻尾部分或全部消失的漢語方言”包括“二百多個縣市的方言”。

陳其光(1991) 探討了鼻音韻尾演變的趨勢、條件、規律等，涉及官話、粵語、閩語、贛語、吳語、徽語、湘語等三十二個漢語方言點的材料。

許寶華(1997) 給出了中古陽聲韻字在吳語各個次方言片的變化情況，包括吳語下五個片，共五十個方言點。中古音收鼻音韻尾的共九攝，每攝取兩個字，考查的是這 18 個字的情況。

最近全面考查漢語鼻音韻尾的文章是鄭林麗的碩士論文“漢語鼻音韻尾的演變”(2001)。該文考證了 $-m$ 韻尾的消變時限，總結了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演變的格局，並對影響鼻音韻尾演變的因素及一些相關問題進行了考查分析。鄭林麗依據的材料多至全國各地的 1093 個方言點，官話、粵語、吳語、閩語、客家話、湘方言、贛方言、晉方言、徽語、平話等全部大方言區都有涉及。她把漢語鼻音韻尾的演變劃分為四種格局： $-m$ 、 $-n$ 、 $-ŋ$ 三元對立格局； $-m$ 、 $-ŋ$ 與 $-n$ 、 $-m$ 以及 $-n$ 、 $-ŋ$ 二元對立格局；祇有一個鼻音韻尾的格局；沒有鼻韻尾的格局。其中三元對立格局分佈於福建、廣東、廣西、江西、海南等省。 $-m$ 、 $-ŋ$ 對立的格局主要分佈在廣東、福建兩省。屬於 $-m$ 、 $-n$ 對立格局的方言點祇有一個，即安徽省銅陵市。 $-n$ 、 $-ŋ$ 格局各省都有分佈。祇有一 $-n$ 一個鼻韻尾的方言點祇有七處。祇有一(尾)的方言點分佈在甘肅、陝西、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內。不存在鼻韻尾的方言點主要分佈於山西省。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存在 $-n$ 、 $-ŋ$ 對立格局的方言點是分佈範圍最廣的。祇有一 $-ŋ$ 尾的方言點“在一個鼻尾格局中佔絕對優勢”。作者指出：“漢語中保存最多的是一 $-ŋ$ 尾，其次是一 $-n$ 尾， $-m$

尾在各方言中丟失得最多。”（鄭林麗 2001：17）

對於方言中鼻音韻尾不如“切韻”音系複雜這一現象，一般認為是由於漢語語音發展中鼻音韻尾的不斷簡化所致。張世祿（1981）總結了漢語語音發展的一些規律，其中之一是：“鼻音韻尾的簡化和閉口韻的消失”。李新魁（1982）也認為：“從總的趨勢來說，鼻韻母是處在不斷消變之中的，鼻音音節是逐漸減少了的。”陳其光（1991）認為漢語鼻音韻尾“發展的總趨勢都是由多變少，通過鼻化分先後消失。”可以說，漢語鼻音韻尾處於不斷消變這一看法在不少研究者中已經形成共識了。

從上文粗略地介紹也可以看出，研究者們所說的漢語鼻音韻尾的消變是比較寬泛的，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

（1）和“切韻”音系比較，現代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單單在數量上減少了。例如“切韻”音系有一m、一n、一ŋ（三個鼻音韻尾，而某些現代漢語方言中祇有兩個或一個。這實際上是鼻尾發生了合併，即三個鼻尾合併為兩個甚或一個。

（2）“切韻”音系收鼻音韻尾的字在現代漢語方言讀音中沒有了鼻尾，但是前面的元音發生了鼻化。例如“切韻”音系的一m、一n、一ŋ尾字，其中的一種或幾種讀為元音鼻化，沒有鼻尾。這是鼻尾的特徵發生改換，轉化為前面元音的鼻化作用了。

（3）“切韻”音系收鼻音韻尾的字，在某些現代漢語方言讀音中沒有鼻尾，前面的元音也不發生鼻化。這是鼻尾直接丟失了，沒有留下痕迹。

上述三種情形實際上在鼻尾消變的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大致說來，情形（1）鼻尾消變程度最輕，情形（3）鼻尾消變程度最重。但是鼻尾在方言中的具體表現是紛雜的，一種方言可能採取其中的一種情形，也可能採取多種情形。

2. 歷史上的鼻尾消變

按照上述鼻音韻尾消變的寬泛情形，很多現象在歷史上也是存在的。例如—m尾，一般認為其消變的進程最快。十七世紀初徐孝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2）、呂坤《交泰韻》（1603）等有一m尾併入—n尾的現象。這不是最早的，十五世紀申叔舟的《洪武正韻譯訓》（1455）俗音中—m尾已經全面—n化了。漢語典籍浩繁，方言衆多，現代漢語有方言的差異，古代漢語也有方言的差異。如果把這種因素考慮進來，漢語鼻音韻尾的消變可以上推到相當早的時候。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以出土材料推求當時音系，認為唐五代就有一m尾、—n尾相混的情況。被廣泛引用的唐末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卻爲‘石’，喚‘針’將作‘眞’。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陰）。”“針”“陰”都收—m韻尾，而“眞”“因”收—n韻尾，胡曾之妻爲四川人，說明至遲在唐末某些四川話中—m韻尾已經併入—n韻尾。可是這個時間還可以提前。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中有少數—m、—n通押的例證，而丁邦新《魏晉音韻研究》（Ting 1975: 264—267）指出當時秦隴方言的一些特點是：鼻音尾—n與—m有相混的現象，眞與耕、耕與侵偶有通押。秦隴與晉、蜀、益的方言現象接近。張琨（1985: 66）則說：“雙唇鼻音韻尾轉變成爲舌頭鼻音韻尾在漢朝秦隴一帶和蜀郡就已經發生了。”丁啓陣（1991: 115）主要根據兩漢詩文押韻的情況考查秦漢時期的方言，指出各大方言普遍存在的一些特點，其中之一是“鼻音尾[—m]韻與[—ŋ]（[—n]）混押的經常性現象反映了[—m]併入[—ŋ]的趨勢”。按照這些研究，方言中—m尾消變的時代已經非常早了，可以上推到秦漢時代。

從一些研究看來，—n尾與—ŋ尾歷史上常見的現象也是合

併。丁啓陣（1991：88、115）從西漢末年揚雄的《方言》標音材料指出“有些方言是不分前後的”，從兩漢詩文押韻的材料來看，“前後鼻音韻尾不分，即[-n]、[-ŋ]不分”也是各大方言普遍存在的現象。郝志倫（1995）統計西漢蜀郡辭賦家的用韻，指出鼻音韻尾的合流已是一個較為普遍的語音現象，其中-n與-ŋ的合韻頻率最高。俞敏（1991）則進一步指出：“（詩經）《齊風》的韻有一個特點，在i、e元音後頭的-ŋ經常變-n。”而據另一些研究，殷商時代的語音中就“陽聲韻不如後代典型，似僅為元音的鼻化”了。（趙誠1984）

關於歷史上鼻尾轉化和丟失的現象，Dow（1974）利用出土的一些材料，認為西北方音的鼻韻尾在唐代初年就已經鼻化了，一些收-n尾和-ŋ尾的字其韻母都是相同的^②。從一些材料來看，古山東方言鼻音韻尾的丟失似乎是其一貫的特徵。下面是經常被引用的兩個例證。《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玄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鄣如夏”高誘注：“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大約漢代齊語中已將一些帶鼻音韻尾的字讀為陰聲韻字了。丁啓陣（1991：219）尚舉出類似箋注4例。虞萬里（1988）考查山東古方音，認為齊人多將收-n尾的“元”“文”“眞”諸部讀作陰聲的“支”“脂”。張樹錚（1991）考查了20例地名用字，9例先秦地名異文以及其他一些陰陽對轉的情況。陰陽對轉顯示出鼻音韻尾字和元音韻尾字之間的一些聯繫，其中有的陰陽對轉可能反映了鼻尾弱化或者丟失的情況。古音材料中陰陽對轉的情況是非常多的，林語堂三十年代作有《燕齊魯衛陽聲轉變考》、《陳宋淮楚歌寒對轉考》（見林語堂1933），楊樹達也撰有《古音對轉疏證》、《古音哈德部與痕部對轉證》（見楊樹達1983），其中都有不少陰陽對轉的材料。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反映了鼻尾弱化或丟失的情況，則需要進行多方面、細緻的

分析。

楊煥典(1983)提出上古漢語沒有鼻音韻尾。他所說的上古是指諧聲時代以前,所用的材料一是《詩經》等的押韻,二是形聲字。《詩經》中有一些陰陽互韻的例子,民歌中陰陽是不能通押的,這就祇有兩種可能,這些字要麼都是鼻音韻尾的字,要麼都是陰聲韻尾的字。如果是陽聲韻尾的字,則《詩經》共十七個韻部中就有十六部屬於鼻音韻尾。這樣的語言是難於想象的。形聲字中也有一些與聲符陰陽不同類的現象,作者認為這都是由於上古時代鼻音韻尾尚未產生的結果。按照這種看法,漢語中的鼻音尾都是後起的。作者認為鼻音韻尾產生的途徑是:“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很可能由於鼻音聲母在連讀中的影響,逐漸產生了鼻音韻尾。”郭錦華(1989)不同意楊煥典的看法。他認為陰陽互韻屬於通韻和合韻,是符合押韻規律的。關於形聲字,郭錦華也認為楊煥典的分析存在不少錯誤之處。歷史的語音現象是一種已經過去的事實,如果說我們賴以分析的中古音已經有一些不能確定的因素,那麼上古、前上古不確定的因素就更多。而且漢語的材料極其多樣,其中也有相互牴牾的情況。對很多問題我們覺得實在難以給出簡單確定的分析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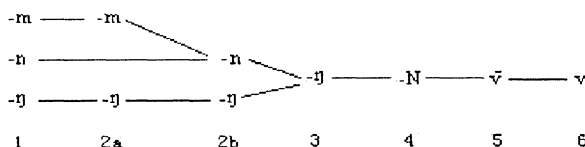
與現代方言不同的是,歷史的語音現象我們祇能根據一些材料來進行推測。而材料是多方面的,張琨說(1987: 85):“漢語文獻不但材料很豐富,而且種類也多。”面對這些種類各異的材料,分析的結論就可能出現差異。有的結論符合事實的程度較高,而有的結論符合事實的程度可能會低一些。總起來說,漢語鼻音韻尾的消變在歷史上是存在的,因為有一些事實比較明確,但是在不同的方言中其具體情形和時間是需要深入考查的。

3. 鼻尾消變的規律

張世祿(1981):“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在於研究語言內部發

展的規律。”漢語鼻音韻尾消變中有怎樣一些規律，這是研究者最感興趣和討論最多的問題。

陳源泉（1972、1973、1975）從他所依據的材料（見本文第1節），對鼻音韻尾消變的過程和規律等作了不少探索。他從現代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各種不同情況出發，來重建鼻音韻尾消變的過程。Chen（1972）提出的鼻音韻尾消變的過程是，首先鼻尾由三向對立（ $-m$ 、 $-n$ 、 $-ŋ$ ，階段一）簡縮為二向對立（ $-m-ŋ$ 或 $-n-ŋ$ ，階段二）；在階段三，所有鼻音尾合併為舌根鼻音尾 $-ŋ$ ；階段四 $-ŋ$ 進一步弱化為不完全（partially articulated）鼻音 $-N$ ；階段五，這個不完全鼻音消失，但前面元音發生補償性的鼻化；階段六，前面元音的鼻化也消失了。陳淵泉圖示這個過程如下：



根據上述情況，陳淵泉提出漢語鼻尾消失的規律之一是：鼻尾的消失在發音部位上自前向後進行，即 $-m$ 尾最先消失， $-n$ 尾其次， $-ŋ$ 尾最後消失。但是漢語方言中也有一些 $-ŋ > -n$ 的情況，陳淵泉認為這與同化有關，而且這種變化在共時和歷時上都要受到很多限制。他區分了無條件的語音變化（un-conditioned）和有條件的語音變化（conditioned）。認為鼻尾消變從前向後進行是無條件的語音變化，而 $-ŋ > -n$ 的變化是有條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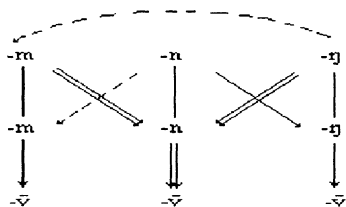
陳淵泉（1973）還將鼻音韻尾的演變同塞音韻尾的演變對應起來。中古有三個和鼻音韻尾部位一致的塞音韻尾，後來演化為兩個（ $-p$ 、 $-k$ 或 $-t$ 、 $-k$ ），然後剩下一個（ $-k$ ），然後這一個變為喉塞（ $-ʔ$ ），然後變為前臨元音的短化特徵（ v ），最後這個短化特徵也消失了。這樣，塞音韻尾的消變也是六個階段，他

也用圖表示了這個過程（頁 40），這個圖與上面鼻音韻尾消變的圖是完全對應的。

陳淵泉（1975）根據對更多漢語方言的考查，得到這樣一些看法：（1）鼻化傾向於從低元音向高元音進行，前鼻音（ $-m$ ， $-n$ ）比後鼻音（ $-ŋ$ ）更易引發鼻化；（2）鼻化的消失，遵循“鼻化存在期相等”（equal lifespan）的特點，最先鼻化的也就最先解除鼻化，最後鼻化的也就最後解除鼻化。（3）鼻音在位置上傾向於往下降，某些鼻元音往上升可以看作是緊或長元音的一種普遍上升趨勢。另外他還說，鼻化使“咸”、“山”兩攝的元音上移；鼻化元音有一定的存在時間，否則，鼻化的消失會從高元音向低元音進行等。實際上看法（1）對 Chen（1972）有所修正，因為如果前鼻音（ $-m$ ， $-n$ ）比後鼻音（ $-ŋ$ ）更易引發鼻化，那麼 $-m$ 、 $-n$ 的消變有可能並不經過 $-ŋ$ 的階段。

徐雲揚（Zee1985）、賀蘇安（Hess1990）對陳淵泉的規律提出了不同意見。

徐雲揚根據現代漢語 8 個大方言 19 個點的材料討論漢語鼻音韻尾消變的規律。他用的方法是：“將構擬出的漢字中古音的韻尾和它們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韻尾進行對比，我們就能夠看到其韻尾在方言中的變化。”（Zee1985：296）他得到的情況是， $-m$ 到 $-n$ 的合併比其他任何合併都更廣泛； $-n$ 到 $-ŋ$ 的合併相對少一些，且好幾種方言中的這種合併都是有條件的； $-ŋ$ 到 $-n$ 的合併在很多方言中都有發生。他指出， $-m > -n$ 和 $-ŋ > -n$ 是歷時演化中的兩個主要趨勢，這可以解釋為什麼 $-n > -\tilde{v}$ 比 $-m > -\tilde{v}$ 、 $- > -\tilde{v}$ 出現得更多。除上述情況之外，其他演變方式都很少。這樣，他歸納鼻尾演變的三個主要趨勢是： $-m > -n$ ， $-ŋ > -n$ ， $-n > -\tilde{v}$ ，可以圖示如下：



(雙綫箭頭表示主要趨勢，單實綫箭頭表示次要趨勢，虛綫箭頭表示偶然情形)

徐雲揚(1985)與陳淵泉(1972、1973)分歧的一個基本方面在於 $-n$ 與 $-ŋ$ (合併的方向上。陳淵泉認為 $-n > -ŋ$ 是演化的主要趨勢，而徐雲揚認為 $-ŋ > -n$ 纔是演化的主要趨勢。

Hess(1990)以漢語的一個方言點——吳方言的溫嶺話，來考查陳淵泉提出的鼻化的共性規律。他認為有兩種方法可以討論吳語的歷史變化，一是拿現代吳語和中古音進行對比，看吳語是怎樣變化的；二是拿現代吳語和原始吳語來對比，看其變化。但是後者有一些困難，所以Hess還是用前一種方法，他用的中古音是按蒲立本(1984)的構擬。他得到的情況是， $*-m$ 有變為 $-ŋ$ 的， $-ŋ$ 也有變為 $-n$ 的；鼻化使一些低元音昇高了，但一些收塞尾的低元音也昇高了； $*-m$ 有可能直接丟掉； $*-am$ 和 $*-an$ 可能變為鼻化而使鼻尾丟失等等。這樣，他得到的結論是，(1)低和半低元音似乎同時變成鼻化音，不經過由低向高、由前向後的連續過程；鼻化的消失是從前向後的，但與存在的時間沒有關係。(2)與陳淵泉的看法不同，溫嶺話及其他吳方言元音的高化不是鼻化的結果，而是吳方言元音普遍高化的結果。(3)溫嶺話及其他吳方言中 $/i/$ 之後的鼻尾按部位變化($-m > -n > -ŋ$)是有語音感知基礎的，等等。值得注意的是，Hess在他的文章中引用語音實驗分析的一些結果來說明某些情形下的鼻尾按發音部位進行的變化，以及低、半低元音更容易鼻化等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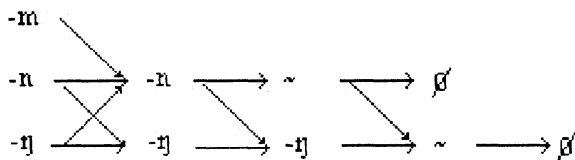
張琨（1983）討論的方言中 * -m 尾都已經讀為 * -n 尾了，“有很多方言還全部或部分保存 * -n 和 * -ŋ 尾。有些方言裏祇有 -ŋ 尾，有些方言中祇有 -n 尾。有些方言中沒有任何鼻音韻尾，原來附有鼻音韻尾的韻母都讀成鼻化元音或者純粹元音。最保存的一組韻母是後高（圓唇）元音後附舌根鼻音韻尾（* oŋ），其次是前高（不圓唇）元音後附舌根鼻音韻尾（* eŋ），最前進的一組韻母是低元音後附舌頭鼻音韻尾（* a/an）”。王洪君（1992：49）將其總結為兩條規律：“低元音後的鼻尾較高元音後的鼻尾易消變；前鼻音的 -n 尾較後鼻音的 -ŋ 尾易消變。”

張琨（1983：4）還說到鼻尾消失的路綫：“鼻化作用是第一步，失去鼻化作用是第二步。平常的假設是鼻化作用先發生，然後再丟掉鼻化作用，變成純粹元音。”關於鼻化發生的地域問題，張琨（1983：4）說：“最早的鼻化作用發生在吳語區，最晚的鼻化作用發生在西南官話區。”

王洪君（1992）通過方言比較詳細地考查了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情況。山西方言存在着文白兩個音韻層次，文讀音的特點與一般北方方言相同，而“白讀音反映了祖語在山西方言中的特殊演變”。其中文讀音鼻尾消變從快到慢的次序是：山（咸）>宕（江）>臻（深）>曾梗通。白讀音的次序是：梗 ≥ 宕（江）>山（咸）一等、山（咸）其他 >臻（深）>曾通。她說文讀音鼻尾的消變符合張琨（1983）總結的其他漢語方言鼻尾消變的一般規律，“即（1）低元音後的鼻尾較高元音後的鼻尾易消變；（2）前鼻音的 -n 尾較後鼻音的 -ŋ 尾易消變”。而“白讀層陽聲韻鼻尾的消變規律祇符合漢語方言的一般規律第一條，即低元音後的鼻尾較高元音後的鼻尾易消變。”白讀音 -ŋ 尾的消變要快於 -n 尾。

陳其光（1991）用 32 個方言點的語音與“切韻”音系對照來探討鼻音韻尾演變的規律。他把鼻音韻尾的演變分為簡單合

併、分化合併、交錯合併、弱化和消失五種類型。綜合這五種類型，可以用圖把鼻音韻尾演變的趨勢表示如下：



不同方言鼻尾演變依據不同的條件，他也分為五種情況。第一種是舌位制約，“音節裏舌位後或低的元音使中古的 η 尾保持不變，或使 n 尾變成了 η 尾；舌位前而高的元音使中古的 η 尾變成了 n 尾，或使 n 尾保持不變”。第二種是元音唇狀的制約，中古主要元音是圓唇元音 o 的，現在演變為收 $-m$ 尾，而展唇元音的收 $-n$ 尾。第三種是作者根據廣州話長短元音的推測，假定中古語音也有長短的對立，這樣，“長元音後的鼻尾容易弱化消失，短元音後的鼻尾則比較穩定。”第四種是聲母發音部位的影響，簡單地說，當聲母為唇音聲母時，中古的 $-m$ 尾由於異化變成了一 $-n$ 尾。第五種是聲調的類別促使鼻尾分化，“當聲調是平聲和上聲時，中古的 m 尾和 n 尾變成了元音的鼻化成分；當聲調是去聲時，中古的 m 尾和 n 尾變成了元音韻尾 i ”。

陳淵泉（1973）將漢語鼻音韻尾的消變和塞音韻尾的消變對應起來，而馬希寧更將塞音韻尾、鼻音韻尾的演變推廣到陰聲韻上，把陰聲韻看作具有元音韻尾，這樣，很多方言的複元音單化就和入聲消失、鼻尾消失也對應起來了。因此她說：“這兩類韻尾（指塞音韻尾和鼻音韻尾）不僅發生在輔音韻尾，元音韻尾也有匹配的演變。”她還認為：“鼻音韻尾演變的速度顯然比塞音韻尾緩慢許多”，“鼻音韻尾由前向後演變是當今漢語方言的普遍趨勢”。（1996：440、463）

許寶華（1997）給出了中古陽聲韻在現代吳語中演變的比較

堅實的材料，但是沒有抽象出更多的推測性的結論，作者自己謙虛地說“尚缺乏較強的概括性和說服力”。作者祇嚴格根據統計數據進行說明：“古鼻音尾 $-m$ 、 $-n$ 演變為今天的口元音韻、鼻化韻和鼻尾韻三類韻母比例差不多，古 $-ŋ$ 尾韻母演變而成的三類韻母比起古 $-m$ 、 $-n$ 兩類的演變結果來，口元音韻最少，鼻化韻較多，鼻尾韻最多。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一 m 尾已經消失， $-n$ 、 $-ŋ$ 以漸趨混同，或收 $-n$ ，或收 $-ŋ$ ，或收 $-ŋ$ ，實際已不構成音位對立，無辨義作用。其中 $-ŋ$ 尾最為穩定，各地鼻音尾韻母中使用最多。”（許寶華 1997：711）

以上各家總結的鼻化規律有同有異，但從多數的語言事實來看，有兩點是可以進行說明的。（1）鼻尾的消變按發音部位從前往後，即按 $-m$ 、 $-n$ 、 $-ŋ$ 的順序穩定性逐漸增加。（2）鼻尾的消變傾向於從低元音向高元音進行。關於第一點， $-m$ 尾消變的速度最快是基本上得到認同的事實，各家也沒有提出異議。在 $-n$ 與 $-ŋ$ 的孰先孰後上存在不同看法，陳淵泉、張琨、陳其光、許寶華等認為 $-n$ 的消變在前， $-ŋ$ 是最穩定的^③。而徐雲揚提出 $-ŋ > -n$ 是歷時演化中的主要趨勢之一。這可能與考查的方法有關，徐雲揚用的方法是“直接對照法”：“將構擬出的漢字中古音的韻尾和它們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韻尾進行對比，我們就能夠看到其韻尾在方言中的變化。”（Zee 1985：296）^④ 從第 1 節鄭林麗比較全面的考查來看，祇有一 n 一個鼻韻尾的方言點祇有七處。祇有一 $ŋ$ 尾的方言點卻廣泛地分佈在甘肅、陝西、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內。她說，祇有一 $ŋ$ 尾的方言點“在一個鼻尾格局中佔絕對優勢”，“漢語中保存最多的是 $-ŋ$ 尾，其次是一 n 尾， $-m$ 尾在各方言中丟失得最多”。（鄭林麗 2001：17）從這一事實來看， $-ŋ$ 尾應該是最穩定的。第二點是陳淵泉和張琨提出來的，王洪君（1992）考查山西方言中的鼻尾消變與此相符合。其他研究者對元音高低影響鼻尾消變的情

況論述較少，祇有 Hess 提出低和半低元音在鼻尾消變上沒有差別。但是 Hess 沒有徹底否定元音高低的影響，低、半低和高元音之間還是有差別的。如果寬泛地看待元音高低的影響，這一結論還是有其意義的。這一點後面還要討論。我們覺得上述兩條規律顯示了影響鼻尾消變快慢的兩個因素，即鼻尾本身的發音部位和前面元音的高低。這是漢語方言鼻尾演變的一個一般規律，雖然有一些例外，但是與大多數語言事實是相符的。它反映了漢語鼻音韻尾的消變在整體上的情形和傾向，王洪君（1992）就把它看作漢語方言鼻尾消變的一般規律^⑤。Chen（1975：16）在提要中就對假設（1）說：“（這個假設）得到相當大部分方言材料的強烈支持。”陳淵泉（1975）依據的方言材料很不平衡，如 Hess（1990：54）所說：“（陳淵泉 1975）官話區的方言點有 718 個，而剩下的六個大方言區卻祇有 376 個點。”他批評說：“某一類的消變對於官話方言如北京話當然是對的，但就其他主要方言來說，就未免太過簡化了，因為他依據的其他方言的材料較少。”這是說從不平衡的材料考查整個漢語鼻尾的消變情況存在一些問題，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陳淵泉總結的規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官話方言出發的，因此是適用於官話方言的。

4. 鼻尾消變的原因

探索一種語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很重要的。歷史語言學家馬爾基耶爾認為：“歷史語言學家最值得做的一種研究是原因的研究，是認定一個個變化背後的力量。”（見《美國語言學家談歷史語言學》頁 212）漢語鼻音韻尾為什麼呈現出不斷消變的趨勢呢？研究者們對其原因也進行了一些探討。

張琨認為是語言接觸及學習的結果。他說：“鼻音韻尾的消失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當漢語發展到一個新地方，當地土著學習漢語時，受到他們自己的語言影響，沒有把漢語中的鼻音韻尾都

清清楚楚地讀出來。習以爲常，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漢語方言中就發生了鼻化作用，甚至於鼻化作用也沒有了，結果就造成了鼻音韻尾的消失。異族入主中原可能發生這種結果。漢語發展到了邊區更會發生這種結果。”西北、西南、山西、河北、吳語等方言的鼻化作用都可能是漢語與非漢語接觸的結果。(1983: 4、5)

艾傑瑞、楊權(1994)把漢語的鼻尾消變看作是漢語的“語言流變”，即薩丕爾所說的一種語言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自身特有的演變(language drift)。黃勇等把鼻音韻尾的消變推廣到整個漢藏語系，認爲漢藏語言“輔音韻尾由複雜到簡單到最終走向消失是歷史所趨”，並與“語音省力原則”有關(黃勇 1995: 53、54)。“漢藏語系語言鼻韻尾的發展演變是其語音內部聲、韻、調相互影響、自我調整的必然結果。”(石林、黃勇 1996: 27)

陳淵泉(1973)認爲漢語鼻音韻尾的消變和塞音韻尾的消變是相對應的(見本文第3節)，馬希寧(1996)進一步認爲元音韻尾和塞音韻尾、鼻音韻尾也是對應的。漢語方言中不僅有塞音韻尾的丟失，鼻音韻尾的消變，也有複合韻母的單化。這樣，整個漢語語音的韻母系統是不斷朝着單元音方向發展的。

郝志倫(2000)認爲漢語的鼻尾消變屬於一種自然音變，符合人類語言發展的一繁一簡過程；同時也與提高言語交際效用有關。他還說：“漢語鼻音韻尾的演變源遠流長，由來已久，從古至今，從未停止。其演變原因紛繁複雜，曲折多變，尚待深入研究和不斷探尋。”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關於鼻尾消變原因的研究是比較薄弱的。鼻尾的消變是否是語言接觸及學習的結果，是否屬於漢語的“語言流變”，是否與漢語語音的整體發展有關，有沒有其他原因，都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證實。

5. 關於鼻尾消變的考查方法

漢語方言衆多，情況複雜，漢語的發展歷史本身是一幅錯綜複雜的立體圖畫。張琨說（1985：43）：“上古中古現代都有方音之不同，所以漢語音韻史不是一個簡單直線，是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同時，漢語語音史本身也還有很多不明晰的地方，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還存在不少分歧，很多問題還遠沒有瞭解到其切實的情形，方言的歷史語音狀況尤其如此。要對漢語鼻音韻尾的消變進行綜合考查，其中涉及很多紛雜、不確定的問題。這裏祇就語音對比的出發點，以及如何看待鼻化規律等問題粗淺地談一點看法。

前面介紹的各家在考查鼻音韻尾的演變時，都是以中古音也就是“切韻”音系為出發點，將現代漢語方言的語音狀況與“切韻”音係進行對照，如果“切韻”音系是—m尾，方言中是—ŋ尾，則認為是—m尾變為了—ŋ尾；如果“切韻”音系是—ŋ尾，方言中是—n尾，則認為是—ŋ尾變為了—m尾。這種“直接對照”的考查方法有兩點需要說明的地方。

第一，把直接對照得到的結果看作從中古音到現代方音的演化規律要慎重。漢語具有方言的不同是自古而然的事實，漢語史的發展並不是按一條直線進行的，而是一幅多綫、錯綜的圖畫。例如本文第2節舉到的鼻尾在歷史上的消變情形，雖然有的在消變的時間等方面上與事實相符的可能性比較小，但是有的方言在古代應該是有鼻尾消失的現象的。例如西北方言（秦隴）、西南方言（蜀益）、齊語等，都有一些切實的材料顯示當時的鼻尾至少和“切韻”音係的鼻尾是不完全一致的。丁邦新（Ting1975）、張琨（1985）的研究都顯示，魏晉乃至漢代秦隴方言就有鼻尾合併的現象。虞萬里（1988）、丁啓陣（1991）等的研究顯示，古代齊語鼻尾的消變也是很早的。歷史上的鼻化已經很難查考，因

爲從押韻等材料祇能得到音的類，得不到音的值。如果兩種不同鼻尾的字都變爲了鼻化韻，能夠互押，我們祇能得到這兩種鼻尾合併的結論。如果祇有一種鼻尾變爲了鼻化，我們得到的結論是，這種鼻音韻尾還是存在的，因爲它不能與另兩種鼻尾互押，它依然是獨立的一個類。實際上對歷時上鼻尾消變情形的考查是難於將鼻化的情況囊括進來的，而鼻尾的合併、丟失更容易從押韻等材料中反映出來。王力（1985：548）說：“古代漢語有沒有鼻化元音？可能是有的，不過在史料上無從證實罷了。”鼻尾消變所指較寬泛，將方言的因素考慮進來，可以說鼻尾的消變在歷史上確實很早就有發生。如果在“切韻”時代或之前的古代漢語方言就有鼻尾消變的情況，那麼至少我們不能說這種方言鼻尾的消變是中古到現代的一種趨勢，它更可能是古代鼻尾不全的遺留（也可能有新的發展）。由於漢語方言複雜多樣，鼻尾的消變應該說是古已有之的現象，不僅僅是中古到現代語音的演變特點。這不影響“漢語鼻音韻尾不斷消變”的論點，但是消變的時限在方言中提前了。

第二，考查鼻化的規律要注意語音演化中複雜、曲折的情況。將“切韻”音系和現代方言音系進行對照是可用的方法，但不是所有的現代漢語方言都直接從“切韻”系統演化下來，有些方言的分化時間可能在“切韻”音系之前。例如前面好幾家都用到閩語的材料，一般認爲閩語從共同語中分化出來的時間比較早，丁邦新認爲（1983：14）“閩語白話極可能是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從古漢語方言而出的。”這樣，閩語從兩漢之交到現在有其自身的演化歷史。按理想的設想，如果那時的閩語具有同“切韻”音系一致的鼻尾，現在以“切韻”音系爲出發點來考查其演化歷史，其間就可能有很多中間過程被壓縮掉了。假如閩語最初有一m尾，中間變爲一n尾，然後變爲現在的鼻化，如果採用直接對照的辦法，就祇能看到一m > 一 η 這樣的一個直接變

化。而這中間的變化過程本來是曲折的， $-m > -n$ 這個階段就被壓縮掉了。要把中間複雜、曲折的情況顯示出來，需要通過全面、細緻的方言比較的方法。同樣，有些方言在中古時期鼻尾就已經出現消變，從中古到現代又發生了演化，如果以“切韻”音系爲出發點，我們得到的也是一個被壓縮了的演化過程。如果進一步從這個被壓縮的演化過程來推導演化的規律，將得到某種程度不符合事實的結論。又如吳語中鼻尾的消變應該是很早的，《爾雅》的郭璞（276—324）注中就已經有“南方人呼刀爲劑刀”，即有些南方方言“剪刀”的語音和“劑刀”差不多了。這說明南方方言鼻尾的丟失在《切韻》之前就有發生，所以張琨說“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吳語的形成早在編定《切韻》之前”。（張琨 1985：46、98）從中古時期到現代，吳語還會經歷新的演化，如果我們祇把三個鼻尾的初始狀態和現代的狀況相比，中間的很多過程都會被壓縮掉。

如果某種方言在中古時期具有同“切韻”音系一致的鼻音韻尾，而這些鼻音韻尾是直接演化到這種現代方言的，那麼用“直接對照法”將是有效的。從已知的情況看來，多數官話方言在中古時期是有三個鼻尾的，中古到現代的演變也有很多材料能夠顯示出來，從這一點上說，以“切韻”音系爲出發點同現代官話方言進行對照是能得出有意義結論的，也即，“直接對照法”對官話方言是適用的。

6. 幾點討論

6. 1 語言規律的相對普遍性

關於鼻音韻尾消失的先後次序，在不同的方言中有很紛雜的情況，但有些現象在統計上是佔很大優勢的。從這個角度說，它與鼻尾本身的發音部位和前面元音的高低兩個因素是有關的，在一般情況下鼻尾是按從前向後的順序消變，按從低元音向高元音

的順序消變的。這反映了大多數的語言事實，是根據語言表現中的多數情況得出的一般規律、具有相對普遍性的規律。

語言學的規律本身和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的規律具有不同之處。自然科學規律的普遍性在一定範圍內常常是絕對的，不會出現例外，哪怕是一個；而且也不會因為時間和地域的改變而出現不適用的情況。但是語言學的規律與此不同，岑麒祥（1956：77）說：“任何語音演變的規律都有它的時間性和地域性。”這說明語言學規律的適用性都要受到一定時間和地域的限制，放在別的時間和地方，原來的規律就可能不起作用。這正是語言學規律與自然科學規律的區別，自然科學規律的普遍性是絕對的，而語言學規律的普遍性是相對的。相對普遍性應該是指語言演變的整體傾向，不是絕對傾向，不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起作用，而是在多數時間、多數地點適用。

在很多時候，我們應該可以從語言的某些整體傾向出發得出帶有相對普遍性的結論。歷史語言學家博杜恩說過：“一般說來，應該分析歷史發展的整個路綫和在長期歷史中語言逐漸變化的整個路綫，以此代替按已知靜態特點所作的分析。”（見康德拉紹夫1985）考查語言歷史變化的整個路綫，意味着可能要忽略某些次要情節，這雖然有“少數服從多數”之嫌，但是如果反過來，讓“多數服從少數”，就“祇見樹木，不見森林”了。由於語言規律的相對普遍性，如果要從絕無例外的目標出發，那麼所能得到的語言學上的規律就太少了。

漢語史上一個普遍承認的事實是，入聲消失是漢語語音演變的一個規律。鄭張尚芳（1990：6）：“入聲發展的總趨勢是逐步走向消亡，隨着不同塞尾的歸併、弱化、消失逐漸併入舒聲。”但是也有極少數情況原來的舒聲變爲了入聲，鄭張（1990）把這種現象稱爲“舒聲促化”。舒聲促化“現象分佈甚廣……涉及面也大”，但是這並不影響漢語中入聲消失這一整體規律。鼻尾的

消變從前向後、從低向高進行，這也是漢語語音發展的規律之一，但是並不排除其中也有少數與此不相符合的例子。語言現象確實太複雜了，要在渺如烟海的語言事實中找出幾個反例是非常容易的。橋本萬太郎（1985）說：“規律總是有例外的。因此，祇是指出幾個例外並不能推進學術。”

6. 2 鼻尾消變規律的一些旁證

歷時語音變化的規律常常能從其他客觀方面找到一些綫索，有些規律與語音的發聲、感知、習得等都有一定關係。關於鼻尾消變與元音舌位高低的關係，董少文（1956：68）早在《語音常識》中就已指出，“[a] 後頭的鼻音韻尾 [n]、[ŋ] 比較弱，其他元音後頭的鼻音韻尾 [n]、[ŋ] 比較顯著。”[a] 後面的鼻尾比較弱，其丟失的可能性會更大。王力曾說：“普通語音學證明，高元音不容易鼻化。”（王力 2000：224）不容易鼻化說明高元音後鼻尾的穩定性更好一些。Hess（1990）也討論了這個問題，他引用其他研究顯示，中元音、尤其是低元音發音時軟腭降低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出現鼻化。比較詳細的研究是林茂燦、顏景助（1994），他們通過聲學和統計分析指出：“/a/，/ia/，/ua/ 和 /ya/ 後面的 /n/ 或 /ŋ/ 時長明顯地比 /y/，/ə/，/i/ 和 /uə/ 後面的短。也就是說，鼻尾時長在主要元音開口度大的 /a/ 後面的，比在主要元音開口度非大的後面的短。”他們說鼻音耦合時長和元音高度有關，但這是因語言而異的現象。文章還指出：“在鼻輔音前面的低元音中，由於鼻音耦合開始得早，使得鼻輔音本身時長較短，而在高元音中，由於鼻音耦合開始得晚，因而鼻輔音本身時長較長。”“鼻韻尾時長及 (V) V/N 時長比值，跟其前面主要元音為低或非低的特徵有關。”低元音後面的鼻尾時長長一些，這是鼻尾穩定程度更高的表現。上述情形說明元音的高低對鼻音韻尾是有客觀影響的。

鼻尾的不同穩定程度也能從兒童的語音習得上體現出來，兒

童的語音習得對 $-\eta$ 是表現出很大優勢的。李壬癸 (P. J. -K Li 1977, 轉見李行德 1997: 61) 調查了兩名臺灣國語兒童的語音習得情況, 發現對 $-\eta$ 掌握得較早, 常常用 $-\eta$ 代替 $-n$ 。李崑等 (2000) 的調查更全面, 他們在北京調查了 129 名普通話兒童, 結果發現: “([n]、[- η]) 這兩個鼻輔音在兒童的音位集合中出現得很早。普通話兒童在習得音節尾輔音過程中最常出現的錯誤是在發音時把 [n] 刪除 (57%) 或用 [η] 代替 [n] (55%)。”他們說: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錯誤的出現是單向的——兒童在語音習得期間總是傾向於在音節中刪除這些輔音而不是增加這些輔音, 用 [η] 替換 [n] 而不是用 [n] 替換 [η]。”兒童語音習得與漢語鼻尾消變的情形從表現上看是一致的, 都傾向於在音節尾刪除鼻音韻尾, 同時 $-n$ 更易於被刪除, 而 $-\eta$ 則常常替換 $-n$ 。他們之間可能是有聯繫的, 因為語音習得反映的是自然狀態下兒童的發音機制和聽覺機制, 這些機制很可能會影響到語音演化的樣式和方向。

鼻尾在語流中的不同表現也顯示出 $-\eta$ 尾更穩定一些。“漢語普通話中, 以鼻音 [η] 結尾的音節在兒化時, 失落鼻韻尾, 元音發生鼻化並卷舌。”(葛本儀等 1992: 54) 而以 $-n$ 結尾的音節在兒化時鼻尾是直接丟失的, 鼻尾的特徵並不通過前面元音的鼻化得到保留。這顯示出 $-n$ 尾在動態表現中的失落現象, 而 $-\eta$ 尾仍然得以保存, 這可能也是一 $-\eta$ 尾更穩定的一種表現。

7. 結語

前面對漢語鼻音韻尾在方言中和歷時上的消變情況, 以及鼻尾消變的規律、原因等作了一個簡略的介紹, 其中就鼻尾消變的規律給出了一點粗淺的感想和看法。鼻尾在方言和歷時上的消變情況已經有很多材料了, 但是這些材料, 尤其是歷時的材料, 應該說遠沒有達到能夠整體瞭解鼻尾全部面貌的程度。這還需要更

多、更細緻的基礎工作，需要整理更多的方言和歷時的材料。如果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漢語鼻音韻尾消變的很多情形將會更加清楚明白。同時，對語音演變的原因及解釋性的研究要加強。瞿霽堂、勁松（2000）：“長期以來提倡對語言事實的觀察和規律的探求，祇要求說明，不主張解釋。”漢語鼻尾消變原因的研究還停留在比較粗淺的層面，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鼻尾消變的規律雖然有不少研究出現，但是對這些規律的解釋研究並不多。如果能夠將共時、歷時的語音現象，音系（phonology）、語音（phonetics）的各自表現結合起來，應該能夠使這方面的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推動。

〔注釋〕

- ①陳淵泉（1972）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利）的博士論文，其後他發表了多篇論文來報告其中的一些發現。由於條件限制，有些論文沒有見到，本文主要介紹 Chen（1973、1975），可見其整體研究情況之一斑。
- ②邵榮芬（1963）認為敦煌別字異文中—m 與—n 相混的情況不多，認為不是當時西北方音的普遍現象。廖名春（1992）則認為“從初唐到唐末五代，從西北高昌、敦煌到河南的黎陽以及胡曾的‘妻族’所在之鄉，都有一—m 尾和—n 尾相混的現象”，但是結論與 Dow 不同，認為—m、—n 相混的“其實質就是收唇音—m 轉為不收唇音—n 尾”。
- ③王洪君考查山西方言文讀層符合這一規律，白讀層不符合。
- ④關於“直接對照法”，第 5 節還要進行討論。
- ⑤山西方言鼻尾的演變有與上述兩條規律不一致的地方（見本文第 3 節），她說：“山西白讀層陽聲韻鼻尾的消變規律只符合漢語方言的一般規律第一條”，而另一種消變情形“與山西文讀層和今天的其他漢語方言的趨勢正好相反。”（王洪君 1992：49）這說明她是把上述兩條規律作為“漢語方言的一般規律”和“其他漢語方言的趨勢”的。

〔參考文獻〕

- [1] 艾傑瑞、楊權 1994, 侗水語語音幾何學：升降曲線、邊緣和二態現象,《民族語文》2期。
- [2] 岑麒祥 1956,《方言調查方法》,文字改革出版社。
- [3] 陳其光 1991,漢語鼻音韻尾的消失,《語言研究》增刊。
- [4] 丁啓陣 1991,《秦漢方言》,東方出版社。
- [5] 董少文 1956,《語音常識》,文化教育出版社。
- [6] 葛本儀等 1992,《實用中國語言學詞典》,青島出版社。
- [7] 郭錦華 1989,上古漢語無鼻音韻尾嗎?——同楊煥典同志商榷,《古漢語研究》2期。
- [8] 郝志倫 1995,兩漢蜀郡辭賦韻文中鼻音韻尾問題初探,《傳統文化與古籍整理研究》,重慶師範大學出版。
- [9] 郝志倫 2000,論漢語鼻音韻尾的演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期。
- [10] 黃勇 1995,李樹何話輔音尾的演變規律,《民族語文》2期。
- [11] 康德拉紹夫 1985,《語言學說史》,楊餘森譯,武漢大學出版社。
- [12] 李新魁 1982,論普通話的音節結構,《語言研究論叢》第二輯,天津人民出版社。
- [13] 李行德 1997,語言發展理論和漢語兒童語言,《現代外語》4期。
- [14] 李鬼、祝華、Barbara Dodd、董濤、彭聃齡、舒華 2000,說普通話兒童的語音習得,《心理學報》2期。
- [15] 廖名春 1992,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別字異文看五至八世紀初西北方音的韻母,《古漢語研究》1期。
- [16] 林語堂 1933,《語言學論叢》,開明書店。
- [17] 馬希寧 1996,漢語方言陽聲韻尾的一種演變類型：元音韻尾與鼻音韻尾的關係,《聲韻論叢》第五輯,臺北學生書局。
- [18] 橋本萬太郎 1985,《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 瞿霽堂、勁松 2000,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語言研究》1期。

- [20] 邵榮芬 1963, 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 [J], 《中國語文》3 期。
- [21] 石林、黃勇 1996, 漢藏語系語言鼻音韻尾的發展演變 [J], 《民族語文》6 期。
- [22] 王洪君 1991, 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 (上), 《語文研究》4 期。
- [23] 王洪君 1992, 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 (下), 《語文研究》1 期。
- [24] 王力 1985, 《漢語語音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5] 王力 2000, 《王力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 [26] 許寶華 1997, 中古陽聲韻類在現代吳語中的演變, 《聲韻論叢》第六輯。
- [27] 楊煥典 1983, 關於上古漢語的鼻音韻尾問題, 第三十一屆國際亞洲和北非人類科學會議論文, 東京—京都。又見《中國語文》1984 年 4 期。
- [28] 楊樹達 1983,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中華書局。
- [29] 俞敏 1991, 東漢以前的舊語和西羌語, 《民族語文》1 期。
- [30] 虞萬里 1988, 文獻中的山東古方音, 《古漢語研究》1 期。
- [31] 詹伯慧等 1981, 《現代漢語方言》, 湖北人民出版社。
- [32] 張光宇 1991 漢語方言發展的不平衡性, 《中國語文》6 期。
- [33] 張琨 1982, 漢語方言中聲母韻母之間的關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三本, 一分。
- [34] 張琨 1983, 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四本, 一分。
- [35] 張琨 1985, 《切韻》的前 *a 和後 *a 在現代方言中的演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 一分。
- [36] 張琨 1987, 《漢語音韻史論文集》,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 [37] 張世祿 1981, 漢語語音發展的規律, 《語文論叢》第 1 輯, 上海市語文學會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 [38] 張樹錚 1991, “齊人言殷聲如衣” 補釋, 漢語言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武漢。又見《方言歷史探索》,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 [39] 趙誠 1984, 商代音系探索,《音韻學研究》第一輯。
- [40] 鄭林麗 2001,《漢語鼻音韻尾的演變》,蘭州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41] 鄭張尚芳 1990, 方言中的舒聲促化現象說略,《語文研究》2期。
- [42] 《美國語言學家談歷史語言學》,徐通鏘整理,《語言學論叢》第十三輯,商務印書館。
- [43] Chen, M. Y. 1972, Nasals and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Explorations in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44] Chen, M. Y.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No. 1.
- [45] Chen, M. Y. 1975,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No. 1.
- [46] Dow, Francis D. M. 1974, Nasalization: A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in the Northwester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 No. 2.
- [47] Hess, Susan 1990, Universals of nas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nasal finals in Wenling.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No. 1.
- [48]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十五。
- [49]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四本,四分。
- [50] Zee, Eric. 1985, Sound change in syllable final nasal consonan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No. 2.

(冉啓斌 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 郵編 300071)